

上
卷

中國古代寓言大觀

王恒展等編

明天出版社



中国古代寓言大观

王恒展等 编

明天出版社

1991·济南

中国古代寓言大观

(上卷)

王恒展等 编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9.5印张 4插页 367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92

ISBN7—5332—1182—0

I·222(精)定价:10.80元

前 言

—

在中华民族瑰丽宏富的文化艺术宝库中，寓言是最早形成的文学体裁之一。它与印度寓言和希腊寓言，构成了世界寓言的三大板块，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有机组成部分。

寓言，在欧洲特别强调故事的虚构性和拟人化。据西方有关材料解释：寓言fable一词原于拉丁文fabula，原来就是指虚构的故事或描绘性陈述。牛津大学《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一九六三年版）给它下的定义是：

“寓言：短小的故事。它不以实事为基础，其中特别爱用动物故事（如《伊索寓言》）并要给人以道德教训。”这一定义既概括了欧洲寓言以故事阐释道理，给人以道德教训的普遍意义，又清楚地指出了“特别爱用动物故事”的总体特点。

在我国，寓言虽然也是一种以事明理的文学体裁，与欧洲寓言有着共同的特点，但由于特有的环境和悠久而复杂的文化背景，又与欧洲寓言同中有异，呈现出自己的鲜明的个性。

在中国文学史上，“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释文》：“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

十言而九见信也。”《史记·庄子传》：“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庄子所说的“寓言”，义为寄托之言，也就是假托别人所说的话。“重言”，义为庄重之言，也就是直接论述作者观点的正言。“卮言”，义为支离之言，是穿插在寓言与重言之间，经常出现的支离零星之言。“寓言十九，藉（借）外论之”，也就是说庄子采用假借别人之口所说的“寓言”，目的是为了取得十言九信的客观效果。从庄子的这一自我说明看，他虽然还没有主观地、清楚地意识到“寓言”是一种或者可以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寓言”尚有一定距离，但这种以“寓言”说明“重言”的方式确已具备了后世寓言的基本特征。更何况《庄子》中“藉外论之”的寓言，就其作品本身来说，已经无愧于今天意义上的寓言。正因如此，后世才称先秦典籍中某些具有讽喻意义的短篇故事为寓言，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名称。

继《庄子》之后，历代文人学者对寓言的外延和内涵进行了大量的论证，而对同一种事物采取了不同的称谓。如《庄子》之后的《韩非子》就称之为“说”，因而《韩非子》中寓言最集中的篇章便名之曰《说林》、《储说》。汉代的刘向在他的《别录》（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分类书目）中就称之为“偶言”，称“偶言者，作人姓名，使相与语。”突出了寓言的虚构性，比庄子的论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南北朝时的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他的名著《文心雕龙》中则归之于“谐隐”、“陆贾”类中，并进行了比较和阐述。许多佛教经典中，则直接称之为“譬喻”，如《杂譬喻经》、《百句譬喻经》等。至于具体的寓言作者，则或名之为“说”，或名之为“戒”，或名之为“喻”，或名之为“志”，纷纭复杂，不一而足。这就给“寓

言”这一概念蒙上了一层模糊的面纱。直至近世，人们才汲取外国寓言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继承我国寓言的传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寓言〕 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是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结构大多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生物或无生物，主题都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寓较深的道理于简单的故事之中。如古希腊《伊索寓言》。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寓言已经盛行。在《庄子》和《韩非子》等著作中都有不少寓言。

——《辞海》

本书的编选，就是以这一概念为界定进行的。

二

中国寓言文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起源于民间，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艺术结晶。与神话比较，神话产生于远古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童年时代”“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而寓言则产生于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的神话时代后期或神话时代之后，是人类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进一步发展并有机结合的产物。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代寓言，虽保存在《庄子》、《韩非子》等先秦典籍中，但从其内容看，像《羝羊触藩》、《牵牛蹊田》、《揠苗助长》、《涸辙之鲋》、《鹬蚌相争》等，多切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大约为民间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矛盾和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全面激化，

天下板荡，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各种思潮的知识分子，或为了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或为了干谒王侯，游说时君，无不挖空心思地搜寻论辩材料。在这种情况下，短小精悍、生动活泼而又带有喻意的寓言故事，便自然而然地分外得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此后的二千余年间，寓言的发展又经历了许多不同的阶段。纵观中国古代寓言的发展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近代这样八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这是中国寓言产生、发展并茁壮成长的时期。从现存的前秦典籍看，最早出现具有后来寓言意义的作品是卜筮书《周易》。《周易》喜用譬喻，有的篇章已经具备了形象、情节、寓义，构成了寓言。如《大壮》上六：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这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譬喻，而具有了寓言的基本要素。当然，与后世的寓言名篇相比，它还显得过于简单，但已能看到处于萌芽状态的寓言雏形。

《周易》之外的先秦典籍，文学史家多把它们划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或称哲理散文）两大类。在历史散文中，《左传》和《国语》多属客观记录，在多数客观记录的历史故事中也并没有借此喻彼的寓意，但其中也出现了少数早期的寓言。如本书所选的《牵牛蹊田》、《雄鸡断尾》等即属此类。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历史散文在中国寓言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绝非止此，更重要的是为后代的寓言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一经调制，即脍炙人口。如后来的诸子散文，汉刘向的《说苑》、《新序》乃至明清许多作家的寓言名篇，多取材于此。在寓言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以记载策士活动为主的《战国策》。

七雄纷争之际，合纵连横之士，腾口说，干时君，以取富贵。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增强说服力，寓言故事和巧妙的比喻自然成了他们最好的游说武器。《狐假虎威》、《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寓言名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在先秦文学中，与寓言关系最为密切的当推诸子散文。可以说除了《老子》、《论语》之外，先秦诸子无一不喜欢运用寓言说理明教。儒家的《孟子》、《荀子》等用它宣扬“仁义”；墨家的《墨子》用它宣扬“节用”、“兼爱”、“非攻”；道家的《庄子》、《列子》等用它宣扬“清虚”、“无为”、“齐物”；名家的《尹文子》、《公孙龙子》用它宣扬“名”“实”关系；法家的《韩非子》用它宣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和专制统治；杂家的《吕氏春秋》则杂取各家之说，用它宣扬自己的实用主义观点……也正因如此，我国的寓言创作才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呈现出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繁荣景象。

二、两汉时期：这是中国寓言进一步发展并渐趋独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寓言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可以说是先秦诸子寓言的继续和发展，如《韩诗外传》、《新书》、《淮南子》、《法言》、《论衡》、《牟子》等典籍中的寓言。这类寓言仍混迹于其他作品之中，仍是诸贤说理明教的工具，无论题材和手法，大多因袭先秦，未脱附庸地位。另一类是以刘向的《说苑》和《新序》为代表的劝戒寓言。这类寓言从内容方面讲，适应空前统一的汉王朝寻求长治久安之道的需要，适应汉武帝以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气候，剪裁旧文，独立成篇，旨在使统治者引为鉴戒，以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从形式方面讲，这类寓言已经摆脱了附庸哲理论文的地位而独立成

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寓言的一大进步。从创作方法上讲，这类寓言多取材于先秦历史散文而寄以新的含义，使我国寓言多历史故事的特点更加明显。从编排上讲，这类作品按一定的内容分类，如《刺奢》、《节士》、《义勇》、《贵德》、《复恩》、《尊贤》、《正谏》等等，使劝戒意义更加集中突出，同时在形式上为后世的《世说新语》等开创先河。正因如此，本书在编选两汉部分时，相对地有所侧重。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我国由统一走向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随着统一的汉王朝的解体，儒家学说失去了一家独尊的地位，而名、法、道等各家思想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成为我国文化思想史上又一个比较活跃的时代。由于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比较复杂，特别是由于世族统治加强，与庶族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因而士林风气也随之而变，这就促进了文化史上以旷达放荡为特征的品评人物和玄学风气的形成。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因循守旧、道貌岸然而时或出丑者有之；行为放荡、不拘小节而众以为怪者有之；身居豪门高位而愚蠢可笑者有之……如此种种，都助长了爱好嘲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魏邯郸淳的《笑林》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笑林》是一本笑话专集，其中许多故事既是诙谐的笑话，又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寓言。后世的《启颜录》、《艾子杂说》、《应谐录》、《笑赞》、《笑府》、《笑得好》、《笑林广记》等等，可以说都是在《笑林》的影响下产生的。在这一时期的理论著作和学术著作中，有一些作品中也有不少寓言，如氏族作家苻朗的《苻子》、刘昼的《刘子》、梁元帝肖绎的《金楼子》、著名学者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本书亦适当采录。

从小说史的角度讲，这一时期又是我国文言短篇小说（尤

其是笔记小说)渐趋成熟和初具规模的时期。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大量出现。这些小说有的“张皇鬼神”,有的错综比类,分门志人,其中也不乏以事明理的寓言作品。这些作品较前相比,则开辟了一条寓言向小说方向发展的道路,为隋唐以后小说寓言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无疑在寓言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在这一时期的蓬勃发展,也为中国寓言的进一步发展输入了新的血液。在佛经中印度寓言的影响之下,我国的佛教寓言也开始大量出现。但这些佛教寓言很难与印度寓言界定,所以本书未予选录。

四、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灿烂辉煌的时期,也是寓言史上继先秦之后的又一个高潮。自隋代起,虽然结束了汉末以降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和战乱,完成了统一大业,采取了一些促进社会繁荣的政策,但因时间短促(即使从隋文帝开皇元年的公元581年算,到隋恭帝末的公元618年,也只有37年),所以不可能形成自己的一代文章,文风上一直是齐梁风气的余绪。在寓言范围内,可以说只有侯白的《启颜录》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启颜录》是继邯郸淳《笑林》之后较早的一部笑话专辑。这部书虽然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之为“事多浮浅,又好以鄙言调谑人,诙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正是这种“浮浅”和“鄙言”表现了它的通俗性和战斗性。这一特点实际上至宋以后才大张旗鼓,显示出它的价值和意义。本书所选的《车翻豆覆》、《遭见贤尊》等可见一斑。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散文、小说在唐朝都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鼎盛一时，这不能不影响到唐代寓言的发展。事实上隋唐寓言创作高潮的出现，正是在这一环境中产生的。

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可谓名家辈出，群星璀璨，传誉当时，光照后世。诗体寓言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应运而生，茁壮成长。著名诗人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都写过许多寓言诗。这些寓言诗与古希腊和西欧寓言以韵文为主的形式是一致的。由于它们与散文寓言比，仍然不占主流，所以本书限于体例和篇幅，只好舍爱。

唐代也是中国散文史上的辉煌时代，特别是自中唐以后，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大家继承了肖颖士、李华、元结等人的古文理论，以复古为旗号，大胆革新，以奇句单行的古散文形式为主，吸收了骈文的某些长处，掀起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改革，这就是文学史上称道的唐代“古文运动”。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寓言创作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从形式方面讲，凡传、记、叙、说、论、解、文、问戒、对等无体不有；从内容上讲，上自人生哲理、宗教政治，下至黎庶忧患、世俗民风无所不包。综而言之，可以分为议论寓言、记传寓言、杂文寓言三大类。再加上上文中提及的寓言诗及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中的小说寓言（也可称为寓言小说），可以说到此为止，中国寓言已无体不包，全面成熟了。议论寓言如元结的《瘰论》、《丐论》，韩愈的《马说》，柳宗元的《鹤说》、《谪龙说》、《辨伏神》，刘禹锡的《说骥》、《因论》，罗隐的《说天鸡》等最有代表性。这类寓言多假事物发议，酷似议论文而具有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标题多带有“论”、“说”、“辨”等字眼，独立成篇，可以说是秦汉诸子散文的进一步发展。在记传寓言中，魏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已开

先河；王绩的《醉乡记》、《无心子传》等继张旗鼓；至韩愈的《圯者王承福传》、《毛颖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等蔚然成风，标志着这类寓言已进入成熟阶段。这类寓言貌似记叙文、人物传记，实则主要意在寄寓作者的胸怀，仍然属于寓言文学的范畴。以上两类，恐怕其他民族的寓言中是很少见的。第三类是杂文寓言，这是中国寓言的主流。唐前，如上所述，这类寓言多为诸子散文或历史散文的附庸。至唐，这一局面已大为改观，出现了大量的不同形式的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柳宗元是中国寓言史上第一个创作了独立成篇、自标篇名的寓言作品的作家，其中的《三戒》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广泛。另外，像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也有不少这类作品。

唐代又是我国文言短篇小说全面成熟并硕果累累的时期。各类笔记名目繁多，传奇小说也在唐前杂史别传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艺术上全面成熟。其中也出现了不少借此喻彼的小说寓言，为中国寓言增添了新的内容。因为这些小说寓言大都篇幅较长，所以本书只选了最有代表性的《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少数几篇。

五、宋金元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隋唐寓言的延续和发展。北宋时期，欧阳修利用自己的地位，借助科举制度，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团结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文坛宿将，再度掀起了一场以复古为革新的古文运动。他们的主要艺术成就虽不在寓言方面，但也写了一些著名的寓言。如欧阳修的《伐树记》、《养鱼记》、《卖油翁》，王安石的《伤仲永》，苏轼的《日喻》、《二鱼说》、《桃符艾人语》等，都是中国寓言史上的名篇。其他如宋祁、王令、司马光等

也有佳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前人题为苏轼所撰的寓言专集《艾子杂说》，可以说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寓言专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列有张太玄《平台百一寓言》三卷，但久已失传）。全书共有寓言三十九篇，以滑稽多智的艾子作为贯穿全书的主人公，讽谕现实的精神、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以虚构的正面人物统领全书的手法等等，在中国寓言史上影响极大。后世的《郁离子》、《艾子后语》、《迂仙别记》等著名寓言专集，显然都受到它的影响。

宋代又是笔记小说盛行的时代。一方面是唐代风气的延续，另一方面是宋初李昉等人新编的五百卷的《太平广记》的影响。有宋一代，从著名文人欧阳修、苏轼、陆游，到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下层文人，不知有多少笔记小说传世。在这些笔记小说中，也记载了许多优秀的寓言故事，如欧阳修的《归田录》、苏轼的《东坡志林》、沈括的《梦溪笔谈》、岳珂的《桧史》、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等。本书对此虽作为重点选录，但因作品繁多，难免挂一漏万。

金元时期的寓言，由于蒙古贵族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推行严酷的歧视汉人和汉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大多集中在元初和元末两个时期。在宋末元初和金末元初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或因社会动乱，或因文学思潮的巨大转变，在寓言创作上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寓言作家多为宋金遗民，他们有的薄视功名，入元不仕，作品多敢于直指现实，如邓牧《伯牙琴》中的《二戒——学柳河东》、元好问的《射说》等；有的则回避现实、回避政治，作品则多涉人生哲理，如戴表元的《一大庵赋》、《蒙夸二氏诫》等。到了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元代统治者的腐朽和无能暴露得愈来愈显，对汉族人

民和知识分子的控制严重削弱，于是出现了中国寓言史上的又一个创作高潮，刘基和宋濂便是在这一高潮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作家，在中国寓言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刘基是元朝进士，曾任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等职。后因倍受排挤、弃官归隐浙江青田故里。他此时写成的寓言专集《郁离子》，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伦理观点。另外，他的散文《卖柑者言》、长诗《二鬼》，也是寓言史上的名篇。宋濂也是元末浙江著名文人。元至正九年，朝廷曾征他为翰林院编修，他固辞不赴，入山为道士，隐居著书。在隐居小龙门山期间，写成了含有许多寓言故事的《龙门子凝道记》和寓言专集《燕书》，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寓言史上的地位。刘基和宋濂同当元末明初，同处东海沿海的浙江省，同在中国寓言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谓双星并照，万古流芳。不过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本书限于三卷编排的局限，考虑到文学史上将二人划归明代的习惯，仍将二人的作品放在明代部分。

六、明朝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俗文学空前繁荣的时期，作为通俗文学之一的寓言文学当然也不例外。这一方面是明朝统治者采取的极端残酷、专制的文化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市民阶层扩大的影响。明朝寓言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元末明初，第二个高潮出现在明朝中叶以后。

元末明初寓言作家除上文中论及的刘基和宋濂之外，还有苏伯衡、贝琼、方孝孺等文人作家。苏伯衡与刘基、宋濂同时，且同时被朱元璋征至南京为官。他的寓言也与宋濂的风格相近，多假借历史故事，运用对话陈说情理。他的《存斋说》、《染说》、《空同子瞽说》等篇什中，都含有不少优秀寓言。贝琼

的寓言则对鱼肉百姓的官吏进行了尖刻的嘲讽，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方孝孺是宋濂的学生，以文章、理学著名当时，后因燕王称帝时命他起草登极诏，不从被杀。他的寓言则旨在揭示人世教训，以内容的哲理性和风格的古朴自然著称。

入明以后的近百年间，由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巩固和发展，社会出现了暂时的安定和繁荣，加之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文化政策，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因而出现了粉饰太平的“台阁”文风，以讽谕为特征的寓言文学当然也就暂入低潮。明代中叶以后，由于政治日渐腐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加之文禁稍弛，于是寓言创作又渐趋复兴，进入了第二个高潮期。这一时期寓言的总体特征是对各种社会黑暗现象进行辛辣的嘲讽。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出现了像《中山狼传》这样别开生面的寓言作品，陈蒲清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寓言史》中称“作者将小说刻划人物形象的方法（如丰富的细节描写）、童话的幻想方式和寓言的以此喻彼的特点，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收到了显著的艺术效果。它的宏伟的篇幅，在寓言史上也是空前的。”此后，像庄元臣的《叔苴子》、耿定向的《权子》、刘元卿的《贤奕编》、江盈科的《雪涛小说》、《雪涛谐史》等等相继问世，可谓雨后春笋，盛况空前。这些寓言内容宽广，风格各异，从各个层次，不同角度，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世态人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寓言创作，继承了《笑林》开创的笑话传统，把笑话和寓言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寓讽谕于笑谈的“诙谐寓言”的创作高潮。赵南星的《笑赞》、陆灼的《艾子后语》、浮白主人的《笑林》、浮白斋主人的《雅谑》、冯梦龙的《笑府》、《广笑府》、《古今谈概》、张令

夷的《迂仙别记》、潘游龙的《笑禅录》等等，都是在此时出现的。像赵南星《笑赞》中《屁颂》这样的诙谐寓言，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是古代寓言的珍品。

七、清朝时期：这一时期上承明朝诙谐寓言的余绪，仍然出现了许多以笑话为讽谕的寓言集。如石成金的《笑得好》、方飞鸿的《广谈助》、游戏主人的《新镌笑林广记》等等。其中以石成金的《笑得好》水平最高，但与明代的此类寓言相比，已是强弩之末。

除此之外，清代的寓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散见于清人文集中的散文寓言，一类是散见于清人小说集中的小说寓言。在散文寓言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唐甄。他积三十年之久著成的《潜书》，大胆地抨击了君主专制，提出了平等的要求和革新政治的主张，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先进的民主启蒙思想的光辉著作。《潜书》体例上模仿《论衡》（初发表时名《衡书》），中间穿插了不少寓言，是一部利用寓言论说哲学政治的重要著作。另外像戴名世、侯方域、王士禛、钱大昕、崔述等许多人的文集中也杂有不少寓言。但这些寓言与前代的同类寓言相比，思想性、艺术性都没有突破性发展，给人一种陈陈相因之感。

相比之下，在清代寓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小说寓言。唐代以后，我国文言小说进入了一个相对低潮时期，因此，小说寓言创作也甚不景气。直至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造性地继承了文言小说的传统，“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既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又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才把我国文言小说的创作推到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聊斋志异》中的作品从广义上讲，多数都寄托了作者的“孤愤”，带有一定的寓言色

彩。其中不但有《劳山道士》、《画皮》、《梦狼》等情节曲折动人，寓意深刻的小说寓言名篇，还有许多短小精湛的琐闻寓言。《聊斋》寓言的显著特点是小说化，它以情节曲折，想象奇幻，描写细腻，寓意深刻而独树一帜。在《聊斋志异》的影响下，文言小说又风行一时，模拟之作纷纷出现。沈起凤的《谐铎》、袁枚的《子不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一大批文言短篇小说中，也有一部分小说寓言。

八、近代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化，可以说是性质变化的时期。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的炮舰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大门，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前途危机，加速了中国的社会变化。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文学也适应这一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变革，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由古典文学向现当代文学的过渡，寓言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本时期寓言可分三类：小说寓言、议论寓言和诙谐寓言。

近代小说寓言直承《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清代小说寓言的传统，虽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但艺术上毫无创新，可以说基本上都是《聊斋志异》的模拟和翻板，如李庆辰的《醉茶志怪》、王韬的《淞滨琐话》等等，所以本书限于篇幅，只举出较有代表性的篇什。

议论寓言以龚自珍的作品最具代表性。龚自珍是近代文学史上首开风气的作家，是一位主张改革现状、抵抗外来侵略的